

总 论

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中曾经演绎了不计其数的联盟斗争的经典事例。不同历史时期的统帅人物和谋臣名将，在运筹政治、外交和军事斗争中留下了无比丰富的联盟战略思想。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研究中国古代联盟战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发掘中国古代联盟战略思想的精华，是中国古代优秀战略文化研究的重要任务。而古代联盟战略思想对于当代国际军事斗争，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中国古代联盟战略的产生与发展

联盟是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政治集团为了共同行动，以条约等形式所结成的集团或正式的联合。联盟的目的是通过与不同国家或不同的力量集团的结合，在相互协调、共同行动的基础上，增强自己的实力，减轻对手威胁的程度，从而改善自己在战略格局中的地位。影响联盟形成和发展的因素很多，而具有共同对敌的一致利益是联盟最重要的基础，因利而合、因利而分是联盟形成和发展变化的最深层次的动因。同时，地缘关系、战略文化传统，对国家或政治集团奉行的联盟政策有着重大的制约作

用，也是影响联盟形成和变化的重要原因。

联盟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原始社会就出现了以血缘关系结成的氏族联盟和部落联盟，奴隶社会时期有了诸侯联盟和城邦联盟，以后又出现了更加理性、功能及作用也日益多样化的国家联盟。

在中国，联盟与战争一样古老。中国自夏商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间虽曾几经分裂，但每次又都归于统一或基本统一，每次分合都为更大范围、更加密切、更长时间的统一创造了条件。中国历史上这种合而分、分而合局面的多次出现以及为实现这种分合而进行的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为中国古代联盟战略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在中国原始社会部落之间的战争中，虽然作战方式十分简单，尚无战略理论可言，但部落联盟的首领们就已意识到与其他部落联手对敌的重要性。中国古史传说中的父系氏族社会后期的大规模部落战争——涿鹿之战，就是一场发生于不同部落联盟之间的战争。蚩尤部落依靠与巨人夸父部落的联盟，首先重创了炎帝的部落，尽收其地，尔后炎帝向黄帝部落求援并结成对抗蚩尤的联盟，由此一举改变了被动挨打战略态势，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中国进入奴隶社会以后，由于战争的频繁和作战规模的增大，以盟会为主要特征的联盟战略开始出现。夏、商、周时期，出现了相对独立的诸侯国，天子与诸侯以及诸侯与诸侯之间通过盟会争取与国，成为谋求战争胜利的重要策略。在这个时期发生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场战争——商夏鸣条之战，就已显现了运用联盟战略的特征。商汤在攻伐夏桀之前，一方面通过“伊尹去汤适夏”，离间夏王朝与各方国之间关系；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广泛争取同盟者，孤

立削弱夏王朝的力量。待桀与九夷的联盟破裂，桀号令“起九夷之师”攻汤而“九夷之师不起”^①之时，汤和伊尹立即号召各邦国诸侯联合兴兵伐桀，一举灭夏，并在取得战争胜利之后，召开了空前规模的“景亳之命”^②大会，通过会盟，赢得了三千诸侯的拥戴，确立了自己天下共主的地位。以后，周文王、周武王灭商，也运用了同样的策略。文王在准备武力征伐的同时，极力分化瓦解商朝的附庸，争取更多与国支持，“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③，完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翦商”工作。武王为完成文王未竟的灭商大业，在牧野决战之前，以观兵为名，举行了有八百诸侯和部落首领参加的灭商誓师盟会——“孟津之誓”^④。从而赢得了力量的优势，为决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春秋时期，会盟更加频繁。这时，旧的社会秩序被打破，新的社会秩序尚未形成，周天子虽然仍是“天下共主”，但其天子的地位明显下降，各诸侯力量大大发展，纷纷摆脱周王室的控制，出现了“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⑤的战略格局。各诸侯国之间也展开了争霸角逐，所谓“诸侯贪冒，侵欲不忌”。各国为了在争霸中取胜，不仅重视在国家内部的变法图强，还十分重视“伐交”，仅据《春秋》记载的朝聘盟会就达 450 次之多。通过广泛开展外交活动，利用矛盾，争取盟友，孤

- ① 《说苑·议谋》。
- ② 《左传》昭公四年。
- ③ 《史记》卷四《周本纪》。
- ④ 《左传》昭公四年。
- ⑤ 《史记》卷四《周本纪》。

立、打击主要敌人，呈现出“春秋必联与国而后战”的局面。一方面，各诸侯国进行睦邻活动，广交朋友，结成必要的互助合作关系甚至军事同盟。如齐桓公、晋文公高举“尊王攘夷”大旗，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争取了各诸侯国的拥护，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则利用外交渠道了解敌情，搜集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离间敌国同其盟友之间的关系，以期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创造有利于己而不利于敌的态势。如城濮之战中晋文公制造秦、齐与楚的矛盾，造成秦、齐与晋联合敌楚的局势，以及后来晋联吴以制楚，楚联越以制吴，秦联楚以制晋等，都是运用联盟战略争取与国，使敌陷于两面作战不利境地的例子。

战国时期，合纵连横的结盟行动成为各国外交的主题。这一时期发生的战争，不仅在作战方式上与春秋时期有很大区别，而且在战争目的上也与春秋战争大相径庭。此时周天子已形同诸侯，不但所辖范围很小，而且在诸侯国中也失去了往日号令天下的能力。因此战国时期要发动战争已没有名义上的约束，战争形式也从争霸战争演变为赤裸裸的兼并战争。周王室维系列国地位的作用已经荡然无存，其宗法礼仪对各国外交活动的束缚力也已微乎其微。到了战国中后期，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兼并日益激烈，都力图通过结盟和瓦解对方联盟，达到保存自己，消灭对手的目的。不仅秦、齐两个大国为了夺取兼并战争的胜利而通过结盟设法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且其他小国为保存和发展自我，确保在复杂的利益关系中不被吃掉，也纷纷采取联盟之策，以求形成合力，阻止大国的兼并。这一时期，产生了专门研究和实施军事外交方略的“纵横家”，主要代表人物有张仪、公孙衍、苏秦等人。他们以“合纵”或“连横”为战

略策略，游说于各诸侯国之间。所谓“合纵”，在战国中期主要是指力量较弱的三晋联合北方的燕国和南方的楚国，组成一条纵向的联合战线，对付秦齐两个大国；“连横”，主要是指由强国拉拢一些弱小国家，采取分化瓦解的手段，打击和蚕食另一些弱小国家，或者由秦、齐两个强国联手攻灭各弱小国家，瓜分天下。到了战国后期，齐国衰败，秦国成为意欲吞并各国的惟一强国。各弱小国家遂把“合纵”的矛头完全指向秦国，而秦国也针锋相对，采取“连横”之策破坏“合纵”，实施远交近攻，蚕食、吞并各国，直至最终统一。这一时期留下的《战国策》、《鬼谷子》以及近年来考古发掘所获得的《战国纵横家书》等著作，进一步丰富了联盟斗争的理论和内容。

三国时期，是中国古代联盟战略发展和成熟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魏、蜀、吴三国在相互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斗争中，彼此利害关系密切，相互间形成了魏较强、吴蜀较弱的战略三角关系。利用三角关系造成有利于己的战略态势，成为三方共同的选择。在这种形势下，联盟与反联盟的斗争纵横跌宕，异彩纷呈。起初，刘备势力弱小，无以自立，寄寓于荆州刺史刘表的地盘内。后按照诸葛亮《隆中对》提出的大战略，首先夺取荆、益二州，转弱为强，对曹操实行战略防御，对江东实行联合，即“防曹联吴”，仅 7 年时间，就改变了四处依附于人的弱小地位，成为与曹、孙鼎足而立、拥有西蜀之地的较强的政治军事集团。然而，随着蜀国势力的强盛，吴蜀之间的联盟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特别是围绕荆州的归属问题，双方一直争持不下，矛盾日显。公元 219 年，吴国借蜀国大将关羽伐魏之机，奇袭关羽后方，夺取了江陵，使吴蜀长期联合抗魏的联盟关系最终破

裂。刘备称帝后，为夺回荆州，兴兵攻打吴国。为了在与刘备集团作战时，避免曹魏攻击，孙权大胆地化敌为友，由联刘抗曹，一变而为联曹抗刘。从公元 219 年东吴偷袭荆州，到 223 年蜀国邓芝出使吴国前的 4 年中，吴蜀的冲突压倒共同利益，而曹魏则从吴蜀相争中获得了调整、巩固的时机。吴蜀争夺荆州之战，导致了蜀孤吴弱魏收实利的结局。为改变这种局面，蜀吴转而恢复了联盟抗曹的战略，才使三国鼎立的格局得到了确立并维系了 40 余年。总体而言，三国以后联盟形式更趋多样，策略运用表现出高度的谋略性和灵活性，联盟战略思想得到了巨大的丰富和发展。

春秋、战国和三国是中国古代联盟战略产生与发展的尤为重要的历史时期。在长达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从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中，无论大国还是小国都迫于生存与发展的压力，对外交活动给予了足够的重视，联盟活动在这三个时期成为处理国家间关系最重要的形式。处在新旧政治秩序相互激荡的混乱时期，思想活动异常活跃，各种思想相互碰撞和融合，为联盟战略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动力。同时，丰富多彩的联盟实践和灵活多变的联盟形式，不仅推动了当时的政治、军事斗争，也使中国古代联盟战略思想逐步走向成熟，中国古代联盟战略思想的基本特征及主体内容也在这些时期中得以确立。

以后的中国历史，每一次朝代更迭时期，战乱时期，多势力对峙时期，联盟战略都表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成为与军事斗争相伴而行的重要斗争形式而不断被采用。如隋文帝利用突厥内部矛盾，灵活运用联盟战略，以拉打结合的策略，激起突厥各部自相攻伐，使突厥实力因内耗而大为削弱，不得不臣服于隋，使隋文帝解除了后顾之忧，可以集中

精力翦灭南方的陈国。唐在统一天下过程中也成功地运用了联盟战略。当隋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隋朝灭亡已成定局时，李渊从太原起兵，为实现“乘虚入关，号令天下”的战略目标，采取了因势借力、以屈求伸、联络突厥、结好李密的基本策略，这对于李渊消除隐患，避免过早暴露雄心、成为众矢之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蒙古在灭金过程中，采用成吉思汗的遗言，实施联宋灭金的战略，派兵从山西临汾、河南邓县一线进兵，利用宋、金世仇的矛盾，从南宋境内借道，直捣汴京，联盟战略运用也十分成功。在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上，联盟战略也得到了成功运用，如清王朝与蒙古的长期姻亲联盟关系，成为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政治联姻，不仅防止了边患发生，使北部边疆长期稳定，而且满蒙结盟对于巩固清王朝的统治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纵观历史，中国古代的联盟，由原始社会的部落结盟，到国家统一后各诸侯国之间的联盟，再到国家处于分裂时期出现的不同国家政权之间的联盟，以至以后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联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这种联盟，是发生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范围内的一种特殊历史现象。春秋以前的会盟只是为争夺霸主地位的一种带有英雄排座次的聚会，与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或军事联盟不可同日而语。以后，在全国统一时期，中原王朝往往视周边的民族及其政权为“夷”，即使与之结盟，也是以对方承认自己的正统地位为前提的，这时的结盟带有明显的不平等的性质，有时甚至只是一种和约，与现代意义的联盟也有很大的区别。因此，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古代联盟战略，必须遵循具体的历史分析的原则。要看到中国古代联盟战略这种社会现象，是

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正确认识这些社会现象，就要具体地、历史地分析其形成和发展变化的条件。切不可脱离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把中国古代一体多元情况下发生的不同政治实体间的联盟战略关系与当今时代民族国家间的联盟战略做牵强附会的比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①。

二、中国古代联盟战略 思想的特色和要义

中国古代联盟战略思想是我国乃至世界战略文化宝库中的奇葩。它的博大精深，令人叹为观止。涉及古代联盟战略思想的古典文献浩如烟海，要对其进行全面发掘和总结殊非易事，我们仅对这一伟大思想的某些特色和要义做了初步的探索。

（一）安民之本 在于择交

重视联盟的作用，是古今中外战略家的共识。中国古代的重盟思想独具特色，它是与中国传统的“慎战”思想紧密关联的。中国历代思想家无不以“慎战”为诫，他们视战争为不得已而为之的“不祥之器”^②，主张“不以兵强天下”^③。强调在强大国力为后盾、思想上物质上都准备好“用武”的前提下，以“伐谋”“伐交”为最佳的战略选

① 《列宁选集》第 2 卷，512 页。

② 《三略·下略》。

③ 《道德经》第三十章。

择，争取以非战形式或尽量少流血的方式解决问题，即“不战而屈人之兵”^①。

正是基于这种“慎战”思想，中国古代形成了“择交”、“重盟”的战略传统。中国古人深知联盟、择交的重要性，把选择邦交视作立国安民的根本大计，强调“安民之本，在于择交，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而不得则民终身不得安”^②。他们认识到国家间的联合对于增强自身力量至关重要，把与诸侯结盟看作“国能否成其国”的大事，把结盟的成功与否视作国家安危存亡的征兆，精辟地指出“轻重强弱之形，诸侯合则强，孤则弱”，“诸侯皆合己独孤，国非其国也”^③，“夫合诸侯，国之大事也，于是观存亡之征焉”^④。

中国古代的重盟思想，尤其强调处理好与相邻周边国家关系的重要性。它从地缘的角度深刻揭示了相邻国家“辅车相依，唇亡齿寒”^⑤的关系，把“亲仁善邻”视为“国之宝也”^⑥。以邻为友、以邻为伴，把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结成友好互助同盟看成是防止强敌入侵、争取战争胜利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不但中、小国家注重邻国关系，而且大国、强国也不敢轻慢邻国。据《国语·齐语》记载，齐桓公取得政权后国力迅速增强，于是提出称霸诸

① 《孙子兵法·谋攻篇》。

② 《战国策·赵策二·苏秦从燕之赵章》。

③ 《管子·霸言》。

④ 贾谊：《新书·礼容下》。

⑤ 《左传·僖公五年》。

⑥ 《左传·隐公六年》。

侯，但管仲却指出“邻国未吾亲也”，称霸的条件尚未成熟，称霸必先睦邻，“君欲从事于天下诸侯，则亲邻国”。为达到“亲邻国”、“安四邻”，使“四邻之国亲我”的目的，管仲建议采取审定边界以归还侵取的邻国土地、正其封疆以避免收受邻国人的礼物和大方地向邻国奉送车马衣裘资币等外交手段，显示齐国的大国风度，树威于四方邻国。齐桓公采取了管仲睦邻为先的外交政策，从而成功地实现了称霸诸侯的战略目的。

中国古代的重盟思想，既强调“和为贵”、“合则强”，积极实行结盟政策，也高度重视拆散敌人联盟的外交活动。古人所推崇的“伐交”，就是主张以积极的外交活动分化瓦解敌人的联盟，正所谓“伐交者，绝敌之援，使不能合也。”^①古人所说“教人之交而使之斗”，讲的也是对敌人同盟的分化瓦解，即把拆散敌人同盟而使它们自己之间相互攻伐，看成是削弱敌人力量的一条重要途径。

（二）盟不足恃，自强为要

中国古代的战略家，不但深知择交结盟对于国家安危兴衰不可或缺，也从一次次的盟变中认识到“盟不可恃”，只有国家的强盛才是战略的根本。

王夫之深刻分析了战国时期六国合纵最终失败和三国时期蜀、吴失败的教训，看到了这样一个规律，即如果己方没有必胜的条件，单纯依靠同盟的力量，只会造成互相依恃，最终又互相贻误的结果。因而他发出这样的感叹：“己未有必胜之形，而恃人以逞，交相恃，交相误，六国之合纵，所以不能动秦之毫末，其佐验也”！他还进一步指出“恃人

^① 《武经总要》前集卷三。

者，不败足也，未能有成者也”，“德必有邻，修德者不恃邻”；“得道多助，创业者不恃助”；“不恃也，乃可恃也”，“善用人者不恃人，此之谓大略”。^①从而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单纯依靠盟友不失败就已经不错，肯定是不会成功的；图谋建功立业，既要得道多助，又要避免单纯依赖外界的援助，只有不完全依靠才能做到正确的依靠，只有善于利用同盟关系而不完全依赖同盟，才是确保战略主动的大战略、大智慧。陈庆年在《兵法史略学》中也发出这样的警示：无论大国与小国，还是大国与大国之间的盟约都不足凭信，“盟约不足恃也”；此可为恃盟苟安者千古之炯戒”。^②

正是基于对盟不足恃的深刻认识，中国古代明智的战略家们在重盟的同时，无不重视寻求自恃自强之道，将自身的发展作为联盟建立与巩固的基础和确立己方在联盟中主导地位的首要条件。并在寻求自恃自强之道方面，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一是强调“求己”“自治”，也就是把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作为实施联盟战略的立足点。“过胜之道，勿求于他，必反于己。”^③“求人不如求己”；“上策莫如自治”。^④二是强调慎修境内之事，也就是加强内政建设，把内部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作为推行“择交安民”的物质基础。“夫不定内，不可以持天下”^⑤，只有“治安中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

- ② 《兵法史略学·卷一》。
- ③ 《吕氏春秋·论威》。
- ④ 陈规：《守城录》。
- ⑤ 《管子·事语》。

国”，才能“四夷自服”，^①“外交而为援，事大而为安，不若内泊以待时。……割国之锱铢以事人，而无自恃之道，不足以自全”，“慎修其境内之事，尽其地力以多其积，厉其民心以牢其城，上下一心，君臣同志，……此必全之道也。”^②三是强调强兵实边，也就是加强战争准备，以军事上的有备无患赢得外交上的主动权。“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事，彼知我有谋有备，不敢轻举，则盟约可久”^③。“勿计敌人之强弱，必先自治，择边帅，搜战士，实边储，备器械，国势富强，将良士勇，请盟则为汉文帝，犯边则为唐太宗”^④。

当然，中国古代战略家强调“求己”和自强，并未陷入自我封闭和自我孤立，不是说只靠自己、不争取结盟和外援。“胜天下者用天下”^⑤，“吾用天下之用为用，吾制天下之制为制”^⑥，善于利用天下的力量来达到制胜天下的目的，把天下一切有用的办法都拿过来为自己所用，把天下一切制度中好的东西都学过来作为自己的制度，这才是中国古代战略家一贯倡导的精神。

（三）非利不动，利义并重

在西方联盟理论中，国家利益是处理国家间关系必须考虑的基本问题，曾被西方的现实主义学派认为是国家对外行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太宗贞观三年。

② 《淮南子·说山训》。

③ 韩琦、范仲淹：《御戎四策》。

④ 《宋史》卷三八六《王刚中传》。

⑤ 《兵法百言·法篇·勾》。

⑥ 《尉缭子·制谈》。

为的基本动因。19 世纪在英国主持国务和外交达 30 多年之久的帕麦斯顿更是强调指出：国家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摩根索也说：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境就只能是国家利益。中国古代联盟战略思想，与西方强调利益的思想也有共同之处。中国古代战略家们很早就认识到利益上相互促进的集团能走得亲近，利益上相互抵触和损害的集团则渐行渐远，得出了“相益则亲，相损则疏”^①的结论，认为只有“与天下同利”，才能实现“天下归之”的目的。特别是兵家和纵横家在“伐交”“伐兵”的实践中，更为重视利益的功用。《孙子兵法》中就多次提到“利”的重要性，认为“利”是用兵作战，伐谋、伐交的基本因素，提出“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原则，强调“兵以诈立，以利动”。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们为了实现“合纵”或“连横”而游说列国，“主要讲的就是各国的利益与力量情势。主张合纵也好、连横也罢，都要从各国的利益和力量优劣中找到各自的战略根据，由此确定谁是可能的敌人，谁是可能的朋友，可以选择的战略目标和联盟方案，权衡利弊，再定对策”^③。

中国古代联盟战略思想在强调因利而动、非利不动的同时，也形成了重利与重义有机结合的思想特征。其独特之处在于深受“礼义”文化的影响，把本来用于教化万民的重义轻利、见利思义、以义为利、先义后利的道义思想巧妙地

① 《鬼谷子·谋篇》。

② 《荀子·王霸》。

③ 李际均：《论战略》 206 页，解放军出版社，2002。

引入谋略范畴，主张“怀远以德，处邻以义”，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并不孤立地讲国家利益，而将利益与道义结合起来共同考察。既强调“利在则义存，利亡则义丧”，不能离开战略利益而空谈“义”，又深刻地认识到谋战略之事不能只讲利不讲义。“谋度于义者必得”^①、“多行不义必自毙”^②，只有以义诛不义，才能“若决江河而溉燧火，临不测而挤欲堕，其克必矣”^③。“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④，“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⑤。只有“义利、利义相为用”才能做到“天下运诸掌矣”。^⑥

这种利义并重的思想，深深影响着中国古代的战略实践。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各种结盟，无疑都是因利而起、因利而合的，但同时也都深深打上了道义的烙印。中国古代战略家在处理联盟关系上，往往高举“义”旗，把道义的宣示作为争取盟友、达成战略目的必要条件。齐桓公高树“尊王攘夷”的旗帜“奉天子以令诸侯”；“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实现了齐国称霸中原的大业。这是在实施联盟战略中以道义为号召实现战略利益的古老而经典的事例。以后，晋文公再举“尊王攘夷”实现“取威定霸”，楚庄王以“仁德”“信义”争取中原诸侯，刘邦以为义帝发丧为名宣告诸

① 《晏子春秋·内篇向上之十二》。

② 《左传·隐公元年》。

③ 《三略·下略》。

④ 《孟子·公孙丑》。

⑤ 《尹文子·上义》。

⑥ 《嘉祐集·利者义之和论》。

侯共伐项羽，刘秀以“立高祖之业救万人之命”为号召图取天下，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制服雄杰等等，都是这种历史现象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重演。

（四）伐谋伐交，谋交并用

在充满着对抗势力和利益争夺的国际环境中，谋略和外交，是保全和谋取国家、民族的政治、经济、军事利益的不可缺一的手段。“谋先事则冒，事先谋则亡”^①。注重“先谋为本”，并把谋与交结合起来，谋与交并重并用，是中国古代战略联盟战略思想的又一独具特色之处。

孙子在《谋攻篇》中讲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这里讲的伐谋、伐交，实际上反映出斗争方略的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伐谋”。即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对敌人正在筹划的谋略及时予以识破，并积极利用自己的谋略挫败之。第二个层次是“伐交”，就是在外交斗争上战胜敌人，以积极的外交活动，争取与国，分化瓦解敌人的联盟，从而在外交上使敌人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孙子不仅把伐谋、伐交列于伐兵、攻城之上，作为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战略目的的最佳战略手段，而且深刻揭示了“伐交”与“伐谋”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指出“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主张将“伐谋”和“伐交”这两种战略手段结合起来，通过运筹帷幄，外交角逐，多种力量并用，使对方陷入无以致战的境地，以制止战争的发生，从而达到“兵不顿而利可全”^②的战略目的追求。

这种精深的战略思想，在中国古代的战略谋划与斗争中

① 《说苑·谈丛》。

② 《孙子兵法·谋攻篇》。

得到了广泛运用。中国战争史上，许多战略企图都是通过“伐谋”“伐交”来实现的，军事谋略在战略层次上的运用往往突出地表现为“伐交”，而“伐交”的成功也往往取决于谋略的正确运用。战略家们或通过外交手段与威慑力量相结合方法，限制对方的军事行动，从而保全和实现一定的利益目的，如墨子赴楚以晓以大义和“模拟演习”的办法证实“公输般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①的必然结局，慑服楚王和公输般放弃了进攻宋国的计划；或通过外交手段，拆散对方的军事联盟，实现己方的军事联盟，使敌人不敢轻举妄动，如诸葛亮派邓芝出使吴国力陈吴蜀共为唇齿得以重建抗魏联盟，粉碎魏国各个击破的战略企图；或采取各种办法孤立打击、削弱敌人，挑起各国与之争斗不休，两败俱伤，以减轻自己所面临的压力，如策士樊馮为了击破韩、魏易地威胁西周东周的图谋，以韩、魏领土交换对楚、赵都很不利为说辞说服楚王联赵制止了韩、魏交易，借助第三者的力量保护了两周的生存。纵横家张仪以口头答应割让 600 里土地的许诺，就诱骗楚怀王上当，破坏了齐、楚联盟；三国时期，曹操利用韩遂与马超相互猜疑的矛盾，仅在交阵时与韩遂闲聊，就拆散了韩马同盟……中国历史上这种以谋伐交、以交施谋的精彩事例不胜枚举。

（五）应权通变，盟随势迁

任何联盟都是因利而合的。结盟国家之间既有共同利益，又有利害冲突，随着利益的互动和形势的发展，当结盟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压倒其共同利益的时候，必然导致原来联盟的瓦解和新的联盟的出现。对此，中国古人早有认识。对

^① 《墨子集解》卷十三《公输》。

于中国历史上各诸侯国之间盟生盟变，“载书可改，大国可叛”^①，即撕毁盟约、背叛大国的层出不穷的盟变现象，思想家、战略家们深深感到“势利之交，难以经远”^②；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③。并由此而倍加重视在实施联盟战略中审时度势，应权通变，盟随势迁，以在多变的国家关系中确保自身的战略利益。《易》云：“变通者，趋时者也。”这个“趋”字便有审时度势，随机应变之意。鬼谷子曰：“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权而揣诸侯之情。重权不审，不知强弱轻重之称；揣情不审，不知隐匿变化之动静。”^④强调处理国际事务必须正确审视天下大势和判断诸侯各国的具体情势，做到正确预测各种潜在的因素可能造成的发展变化，以采取正确的因应之策。而诸葛亮则运用汉文帝刘桓以低姿态对待力量暂时处于强大的匈奴和先帝刘备以优厚宽仁态度处理与东吴结盟的矛盾的经验，告诫蜀国君臣在对待结盟问题上必须“应权通变，弘思远益”，而不能以眼前利益和匹夫之忿来处理^⑤。

中国古代战略家们在实施联盟战略中的应权通变、盟随势迁，并不是那种任凭意兴、朝三暮四的直觉行为，而是注重以动态的眼光观察联盟各方的分合消长，在审时度势的基础上掌握可乘之情、可用之机，随势迁移。他们认为，“天

① 陈庆年：《兵法史略学·卷一》。

② 《诸葛亮集》卷二《论交》。

③ 《史记》卷四二《郑世家》。

④ 《鬼谷子·揣篇第七》。

⑤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